

读书

张伦

作者张伦为法国赛尔奇-巴黎大学社会学教授

中国民主季刊

第3卷 第2期

2025年5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 吴国光 《走向共产党后的中国》

**题记：**这位出色的政治学家的特殊之处不仅体现在其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上，也体现在其对改变中国政治的期望上。如果说前者是学术、知识领域的，后者则是属于广义政治领域的，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行动者式的关怀与努力。

这是一部包含三卷的厚重文集，汇集了作者二十多年来在海外教学研究所撰写的各种学术论文、时评及访谈、演讲的笔录，包括一些思想随笔及回忆文字。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部独特的著作，由一位独特的作者写成。

作者吴国光，现为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得学士、硕士后，曾任人民日报主任评论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后赴美在哈佛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分别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毕业后曾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哈佛费正清中心博士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与亚太关系讲座教授。他长期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及转型、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精英政治、全球化，加上本书，大概有二十四五种中英文著作出版问世，其中多种被译为法、日、韩等文字，可称得上是著作等身的学者。



吴国光 著  
博登书屋  
2023年11月

独特经历决定了他的研究写作与西方甚至一些华人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不同，他不仅具有第一手对中国政治尤其是高层政治的观察，同时也受过系统的现代西方学术训练。在西方著名学府从事教学研究，使得他的文章既有学术上的严格与深度、宽广的视野，又具有那种因有过贴近研究对象的经历，所带来的某些独特的观察视角与写实感。众所周知，因中国的体制、中国政治的运作的不透明，使得中国政治的研究困难重重，鲜少有那些让人既感到信服，又具有理论高度的研究成果出现。一些研究受制于资料来源与研究者的身份、所处环境的限制，常常被迫牺牲研究的客观性，且可能缺乏该有的审视的批判精神，被中国官方公开的信息所迷惑、局限，得出轻泛的结论，而另一些研究又因批判立场带有简单化的倾向。至于一些我们能见到的当事人的回顾，又因缺乏足够的距离与学术的分析提炼，也无法给我们提供高水平理解中国政治的一般性运作规律的理论认识。吴国光教授的特殊政治与学术经历，让其避免了这些问题在研究文章中出现。他可谓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最恰当的特殊人选。也因此，他的研究与评论深受专业人士及各方读者、听众的关注，在专业领域与公共空间都备受赞誉，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

如借作者的话讲，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个人经历对于确定研究的选题、观察事物的能力、展开论述的价值导向，都是具有重要作用的”。(p.522)但他对中共党代会那些精彩的研究却不只是“个人经历的产物，而是学术研究的结果”，尽管是“深深植根于在中国所经历过的政治运作”(p.521)——作者是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之一，深度参与该次党代会的筹备组织工作。在许多人看来，中共的选举乃一种虚伪的装饰，中共的代表也都是花瓶，毫无任何真实的政治意义，也没有民主的价值，因此加以轻视忽略。但作者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研究切入点，“是因为它涉及中共的根本

制度” (p.481), 是“了解中国政治的奇特之处”的关键。(p.528) 这展现了作者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功力。正像许多出色的学者那样, 通过研究, 他要回答一个让人困惑之迷: 在中国“非正式政治压倒一切的情况下, 为什么还要创立一个正式制度并保持它的运作? (p.487) 他要去揭示中共维持这样一个形式, 中共的领导人花大力气去进行操作的目的。因为, 那牵涉到政治上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权力的合法性构建。此文集共分八辑, 其中的第四辑汇集的文章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除了就其相关著作“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的制度运作”(中文版, 香港中文大学, 2018; 英文版,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5) 进行介绍展开讨论外, 作者还陆续评论了中共最近十九、二十两次代表大会的一些特点, 借此来验证其理论结论的可信度, 同时, 对这几次大会运作及变化所传递的政治信息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也是因为对中共党代会长期的研究及理论的归纳, 他对这些大会的评论, 无论是以访谈还是时评文章的方式出现, 都具有那些政治八卦式“听床师”的评论者所不具备的透视力与深度。事实上, 正因这种透视能力及观察深度, 作者对这些大会及中国政治演变的预见与分析才更加到位。

如果说前哈佛大学教授默尔·费因索德 (Merle Fainsod) 用“间接证据”加“制度分析”方法, 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写出《How Russia is Ruled》(《俄罗斯是如何被统治的》) 一书, 深入描绘苏联共产党极权国家如何运行, 让西方第一次系统性地“读懂”苏联, 奠基了所谓 Kremlinology (克林姆林学) 的话, 吴国光教授围绕“中共党代会”的相关研究论述则同样具有类似的开创意义, 它让人们对中共的政治运作、制度运行有了一个跨越层级的认知, 且深入具体。与费因索德不同的是, 吴国光的研究不是使用间接证据, 而是基于其直接的参与观察。其研究也不是费氏整体宏观对苏联体制的概

况的介绍分析，而是通过对党代会这样一个微观制度来分析中国整体的政治制度。饶有意味的是，费因索德的研究也探讨到国家机关（如最高苏维埃）与实际决策中心（政治局、总书记）的区别。虽然制度同样看起来“铁板一块”，但苏联政治中实际存在不少非正式的运作机制。而本文集的作者的研究，以党代会为例，揭示其是一种正式与非正式、公开的实际运作与制度的混杂，通过作者称之为“制度操控”（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p.508）“权力剧场”象征性表演的过程，以便达成其解决合法性赤字的、适度消解政治精英与党魁之间的紧张的政治目标，让中共主要领导人权力的合法性得以确认。作者认为“中国政治固然奇特，但它必须、也能够被纳入政治学的普遍理论中来讨论、来认识，而这样的讨论和认识可以同时丰富我们对中国政治独特性的理解和对政治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普遍性的理解”（p.529）。他借此研究对政治合法性这个政治学、政治哲学核心命题展开讨论，提出三种不同的“确认性合法性（confirmative legitimacy）”，“参与性合法性（participatory legitimacy）”与“顺从性合法性（submissive legitimacy）”的区别（p.463-464），这是一种非常具有创意的尝试，相信会对政治学的一般研究有很大的启发。

此外，这位出色的政治学家的特殊之处不仅体现在其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上，也体现在其对改变中国政治的期望上。如果说前者是学术、知识领域的，后者则是属于广义政治领域的，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行动者式的关怀与努力。作者试图在关于中国的研究中，重建一种有意识的既尽量保持学术研究该有的客观，又不丢弃作为一个现代世界公民对故土中国乃至世界命运的伦理关怀，这体现在他关于韦伯方法论的讨论上（pp.1185-1199），更贯穿在整个文集的文字中。这恐怕也是他与一些无论是西方还是华人学者之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不同。作者并不掩饰，直言他希望中国走向民主自

由的价值选择，许多思考也是围绕此展开，“尝试为中国走出专制制度，实现向自由、民主、法治的大转型提供战略思考”（p.III）。此书的标题也很好概括了这一点。

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作者不断去探讨后天安门时代、中共已经丧失其自我改造的动力与机会、权贵的利益进一步固化的格局下，中国政治变革的动力为何的原因。其结论是他所称之“民变推动官变”的机制与路径。需要说明的是，他所称之的“民变”并不是一般人所联想到的那种极具破坏性的传统造反，他这里是借用一个中国人通俗易懂的词汇来概括那种“老百姓对于政府强制要他们玩的现在这个游戏规则，对于他们所处的这种状态，非常不满意，因此采取行动，要求改变”的集体行动，如小岗村民分田包产到户、知青要求返乡、民主墙、当然还有八九运动等等。从这个术语的选用与界定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那种打通传统思想与现代学术资源、民间活动与学术探讨的藩篱的企图，并借此对改变中国政治有所助益的努力。在作者看来，只有通过一系列的这类民变，才能促使官方有所改变，达成政治制度及政策改变的“官变”。而之所以中国会发生这种官变最根本的肇因，是现行不惜代价发展经济、不惜代价维稳这两个不惜模式难以避免的失败（p.902）。作者在本文集的第三辑中，就为什么这个现行的中国模式会失败，其内在矛盾所导致的种种问题，做了多方面的分析与探讨。

要理解这种中国模式的形成，显然是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共对天安门运动的镇压带来的种种后果分不开的。本书的第一辑恰是作者对八九天安门运动的分析，对其中一些关键的节点上的政治博弈、人物角色的剖析。对赵紫阳这位前中共领导人，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负责人的政治思想及遗产，作者也在第二辑里做了些非常客

观且十分精到的分析与评价，对澄清外界对赵的一些误解，阐扬他的政治遗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中国模式在经历其风光的阶段，逐渐进入某种危机状态后，中国迎来了习近平的登台。如果我们从作者的整册文集通读下来，会发现习近平的登台及其之所以能做大，直到成为具有超过毛的权力的强人的这一过程，是与中共的制度、这个模式内在的逻辑有直接关联的。习近平时代出现的——作者称之为“逆转型”的现象，是习为维护这样一种模式，修正这种模式所作的新的努力。而习近平试图强化党国机器，维护一党专政的稳定与持续，对党的内部及社会加强控制，反过来会弱化这个党国机器的社会治理能力，出现某种上面控制能力越强，对下治理能力越弱的悖论 (p.886)，最终危及这种模式、这种制度的存续，而这种悖论在现有体制及政策下又注定是无解的，这也是习近平时代施政的一个死结。

这部篇幅浩大的文集（1300 多页）中的作品时间跨度甚大，见证了作者的勤奋与多产，是其过去二三十年对中国政治不同时期的思考的结果，牵涉众多的论题，显然我们这里无法做更多系统的介绍。但纵观其中，是有些基本的脉络一以贯之的，就是认识历史、总结经验、审视遗产、分析当下、重建文化，为走向一个没有中共专制统治的未来中国做准备。因作者所具有的职业及学术与知识的背景，这种思考与今日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民主自由事业被有机相连起来。将中国置于世界之中，将世界受到的中国冲击与影响一并加以探讨，这亦构成又一个与一些类似的对中国的研究与批判的不同。作者认为，了解中国政治对理解今天的中国及其对世界的挑战息息相关，反之亦然 (p.528)。或许，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路途与世界范围内民主自由事业要回应的新挑战、民主的更新再造已经很大程度上不可分离。那么，对所有坚持民主自由价值的人们，希望看到民主在中国实现

的人们，吴国光教授这本文集应是他们的必读之书，从书中的分析描绘中找到某些行动路径的启发，找到未来改造中国制度的可能的着力点。相信所有读过这本书哪怕是其中一部分的读者，一定都会很受启发。